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红岩 風骨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编著

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一样，  
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迎接党的十八大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出版工程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迎接党的十八大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出版工程  
◎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一样，  
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 编著

# 红岩 風骨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岩风骨 /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编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229-05914-9

I. ①红… II. ①重… III. ①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IV. ①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6202 号

## 红岩风骨

HONGYAN FENGGU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编著

主 编: 厉华

副主编: 郭晓林 刘立群 夏洪海 李 葭 江 叶

编 委: 丁 颖 郭 亮

---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王怀龙 郭 宜

责任编辑: 王怀龙 杨 帆

责任校对: 郑 葱

封面设计: 郭 宜 刘 洋

版式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mm×1 092mm 1/16 印张: 31.625 字数: 460 千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5914-9

定价: 45.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

前言 QIANYAN

## 红岩的记忆

重庆这个城市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环境因素决定了它成为中国战时的首都。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大舞台，承载了国共两党的团结、斗争的历史过程，它见证了国民党、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国家独立以及争取人民民主奋斗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和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使社会大众和中间力量从对国民党的期望到失望直至绝望，对共产党的同情、支持到拥护。而重庆的红岩就是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赢得天下的一个关键节点。

抗战时期按照国共合作的约定，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和由武汉迁来的新华日报社。为了加强国统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共中央在重庆秘密建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隐蔽在八路军办事处内，负责领导南中国十三个省区的地下党工作和文化宣传、群众、军事工作。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在整个抗战期间采取的是一边抗战、一边要解决共产党的问题，所以国共两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就一直伴随着既要团结也要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周恩来同志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主任、国民党战地军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共谈判代表的身份在重庆主持工作，董必武、凯丰、邓颖超、吴玉章、博古、叶剑英等在办事处和南方局机关与一批共产党人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国统区的地下党发展壮大抗日力量。

红岩本是重庆的一个地名，它没有任何的历史和政治的含义。由于地理条件和环境的因素，用红岩为地名的不只是重庆有，就是人名也有用红岩的。

20世纪20年代末，一个叫饶国模的妇女买下了叫红岩嘴的一片荒坡红石谷地，在此开办农场，种植经营花果蔬菜，开始走她实业救国的经营之路。作为中华民国开国有功之臣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饶国梁是她的哥哥，坐落在大足县的“饶国梁纪念馆”对她的影响最大，这个出身书香门第的女子冲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束缚，少了一些女子的温情脉脉，有了一种巾帼英雄的侠义肝胆，她把为国为民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坐标。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史》一书中对她的记载是：“农场主人刘太太饶国模是一位有强烈爱国思想的进步女性。她的哥哥饶国梁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她的三个子女都是共产党员。长子刘参化与周怡、次子刘圣化与中共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有直接联系。他们分别向她推荐，她慨然允诺，欢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大有农场建房。大有农场是一片小山林，这里果树成荫，四季常青。饶国模这时正在计划建造两层楼房，办事处出资3000元增加一层，并言明三年以后开始付房租，但饶国模却把全部房屋交办事处使用，并且始终没有收过房租。饶国模与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结下深厚的友谊，从工作上、生活上热情支持和帮助重庆‘八办’，她也受到共产党人的深刻影响。重庆‘八办’撤销，南方局东迁以后，她继续与中共组织保持联系，在极为艰险的1948年毅然申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饶国模开办的花果农场成为中共在重庆的办事机构后，这个没有行政关系的村庄，国民党给了一个门牌“13”号。红岩村这个原本的“大有农场”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联系在一起，使它有了一种超越经济、地理价值的革命象征意义！红岩，超越地域概念而有了一种人文的价值。红岩，积聚共产党人的奋斗奉献精神，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气质和不朽的人格。

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有一件饶国模1950年写给在重庆的西南局的信，它是写在一张红布上的，内容是：

中共成立今届廿九周年,解放战争已获全面胜利,全国人民无不鼓舞庆祝,而直接参加革命人士更属欣慰无极。因国模自愧对革命事业贡献殊少,值兹西南解放后第一次公开庆祝伟大纪念之日无所奉祝,特将重庆市红岩村内房屋两栋,果园一个,连同地皮一千方丈敬献我人民政府。盖抗战时期此地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毛主席暨党国诸先进均曾光临,地名红岩符合红军发祥之兆。谨献此地略表敬崇,并作永久纪念云。敬祈

中共中央西南局允纳

1950年中共成立二十九周年纪念日  
饶国模敬礼

饶国模,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她将自己的地方“租给”中共八路军办事处,盖八路军办公楼、开辟菜地,修建托儿所,新建礼堂和新华日报的秘密纸库,包括修建墓地,不但要在经济上、物质上给予帮助,就是老人、幼儿她也是帮忙照顾。1985年,邓颖超回红岩曾经深情地说:她把我们的生老病死都管完了!饶国模,在当年虽然不是非常富有的工商、农产业经营的实业家,但是她的资金利用率可能在当时是最高的!她的资金使用的回报率也是空前的!

八路军驻重庆的办事处在红岩,中共中央南方局隐蔽在红岩,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在这里交错:与国民党公开的交往、与南方十三个省市地区地下党的秘密关系,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面对国内外社会,与延安之间人员、情报、物质等的秘密的联系和往来,使红岩成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大基地。饶国模的产业收入,甚至是个人的积蓄,对八路军办事处她是毫不吝啬,有求必应。虽然与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有一份租借红岩办公、修建房屋的合同,但是八路军从来就没有交过钱,而且还经常从饶国模处拿钱。她用自己的产业收入支撑了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在重庆的大多办公经费和生活经费,她把钱的效益发挥到极致。新中国成立后,她有感共和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成就,欣然将自己的红岩村土地房产全部捐给政府,实

现了她追求的“大有”。从1939年到现在,红岩村作为一个有形的资本,其价值、效益、回报、意义远远小于红岩品牌这个无形资本。饶国模与在红岩奋斗的共产党员一样,用自己的思想、精神铸就了一种特有的气质,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红岩风骨。

在金钱与理想的天平秤上,理想为重。金钱不万能,离开钱也不能,如何运用金钱?怎样把金钱用到最能够发挥效益的地方?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饶国模她借钱租地给八路军办事处,如果她收取回报,是没有任何可指责的,也是应该的。可是她有感于中共的坚持抗战为国为民,她觉得能够用自己的财产支持抗战,也是一个民族一员应尽之责。她是一个经济人、她是个实业家,善于经营管理使她有了经济能力和财富。有钱就要投资,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但是饶国模像历史上的许多爱国工商人士那样,把自己的金钱投资于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上,她也需要回报,只是这种回报是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这种回报不仅只是自己的解放,而是大多数。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档案(R001)记载饶国模:“她的农场内果木繁茂,四周极少住户。既便于党的工作,又利于防空,是我党建立领导机关的一个难得的好地方。经过秘密联系与公开工作,饶国模对我军要在大有农场内修建重庆办事处欣然应允。双方商定,由办事处出资3000元,饶国模负责建筑。房屋修成后,办事处使用三年,以后如要使用就得给付房租。实际上,这栋房屋办事处使用达八年之久,饶国模并未收取房租。”

红岩村,作为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和隐蔽其中的南方局的所在地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指挥中心。在这里工作的人员大都来自延安和八路军前线。公开的工作有:公文转报、签批、审核;与国民党的相关的部门就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军需、情报等问题进行联络、沟通、协调;抗战宣传方面事宜;与社会各方面的交往沟通。秘密的工作有:领导国统区地下党组织、掩护负责南方局机关的工作、保护转移被通缉的同志、抚养烈士后代、秘密战线工作。根据红岩历史博物馆档案(R001)记载:“……来往南方局的地下党干部很多,有前来报告请示工作的,有调回参加学习、整风的,有奉命回来等候分配新

工作的,有因在下面暴露身份撤退下来的,也有从延安派出来转入地下秘密工作的,其中有省委、特委、中心县委、县委等各级负责干部,有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特、财、文等机关内部工作的……情况多种多样。”处于国民党严密监视的红岩村革命者能够在国民党统治区“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是什么样的吸引力?是什么样的凝聚力?是领导人的人格魅力和表率作用所形成的红岩风骨。周恩来同志,以中共代表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将副主任、国民党战地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在重庆展开工作,他有一部国民政府专配的小轿车,周恩来出入红岩村,都要主动问办事处有没有需要搭车的人,以至大家把周恩来的专车称为红岩村的“小公共汽车”;董必武在办事处负责经济管理的账目工作,一次出现六角钱的差错,经过反复查找没有结果,董必武为此事几次作检讨,检查失误,承担责任;许涤新同志奉命到香港筹措资金,在儿子生病治疗需要一些经费的时候,他坚决不愿意动用组织的经费,以至耽误了孩子治疗的时间,使自己的孩子留下残疾;王辉同志在红岩负责管理南方局的秘密经费,当她调回延安工作时,重庆方面告知交接经费有一万元钱的差错,王辉全家省吃俭用,甚至变卖家当,上交了一万元的差错,但是后来当捐款人补交了少放进装钱口袋里的一万元,组织上将王辉上交的一万元退还给她的时候,王辉拒绝接受,她说:“宁亏自己、不损组织……”吴玉章,被尊称为中共五老之一。抗战结束后,他作为四川省委书记坚守重庆,领导地下党加强农村工作,准备发动游击战争;同时,加强城市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从各方面支持农村工作。正当吴玉章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工作的时候,妻子游丙莲在乡下病重的消息传来,由于忙于公务,实在无法分身,吴玉章立即派儿子吴震寰回荣县照应。1946年10月24日,荣县老家传来了妻子游丙莲病故的消息!站在曾家岩50号的办公室里,吴玉章望着川流不息的嘉陵江,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他与妻子结婚50年,却因奔波革命工作,前后只与妻子相处不到6年的时间!自己几十年奔走革命,颠沛流离,很少能顾及家庭,妻子游丙莲在家含辛茹苦,勤俭度日,免去了自己的许多后顾之忧,想到妻子病重竟然无法回家去陪伴她,如今她却病逝家乡,自己却仍然不能够

回家送别敬爱的妻子！妻子丙莲虽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农家妇女，但由于常常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也渐渐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对自己长期不在家中，从无半点怨言，她总是那样的理解和支持自己。想到此，吴玉章竟然失声痛哭了起来！他对着江水、强咬牙关、默默地呼喊着妻子的名字：丙莲、丙莲！想到自己不能够亲自回家料理丧事，吴玉章在办公室怀着对妻子的无限深情提笔写下了《哭吾妻游丙莲》的祭文一篇：

我哭丙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五十年，我离开你就有四十四年。我为了要打倒帝国主义的压迫，专制政治的压迫，社会生活的压迫，在1930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由于你的克勤克俭，使儿女得以长成，家庭免于贫困。满以为革命功成，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料不到四十年来，中国的革命前途虽然走上光明，而迂回曲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你既未能享受旧时代的幸福，又未能享受新时代的光荣。今别我而长逝，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能不令人伤心。

我哭丙莲，……我参加革命，家中全赖你苦撑苦挣……使我这天涯海角之人得以安心。……我本是一个革命家庭，我二哥为倒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悲愤自缢而牺牲，我大哥因大革命失败而牺牲，我四侄鸣和因土地革命而牺牲。这种种不幸，犹赖你能安慰嫂，团结侄辈，使家庭和顺。你待人忠厚，做事谨慎，使亲友称誉，你不愧贤妻良母典型。

亲爱的丙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因为我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得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益于事。还因为我们虽然战胜了日寇、法西斯蒂，而今天我们受新的帝国主义和新的法西斯蒂的压迫更甚。……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们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打倒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蒂，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繁荣的新中国，以慰你在天之灵，丙莲，安息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

吴玉章的这篇祭文，情深意笃，深切地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热爱

祖国,忠于爱情,公而忘私的高尚情操。

红岩村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指挥中心,培养和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坚守革命的气节是肩负重任的红岩人第一要务。南方局的领导周恩来、董必武通过不断地加强学习教育来保持南方局工作人员的思想纯洁性。虽然是国共两党合作,但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对共产党的办事公开机关及共产党员的监视是严密的,稍有不注意就会出问题。因此,南方局对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要求是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提出“公开化、合法化、职业化”和“勤学、勤交友、勤学习”的“三勤三化”的要求。1983年,曾经在红岩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回忆了一些当年在红岩的生活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原始的真实画面,感受当年的红岩人(R001):

郭正:我们在重庆领导上很重视我们的学习,总理亲自给我们讲课,讲党的历史,时事两个星期一次……

牟爱牧:办事处开会,总理要求我们勤业、勤学、勤交友,国民党那样搞我们,我们没有一个慌张、惊慌失措,国民党特务来了我们先顶着,我们都是不怕的,我们为什么工作?为革命。

黄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上下团结一致,不怕死不怕杀头,我们是个什么思想,什么信仰?那时抓得很紧,那时抓政治思想和现在比一比,那时不分高低不分贵贱。在国民党搞反苏反共高潮时,董老对我们进行气节教育,要我们编好口供,我们经常背。……总理曾说:“你们在残酷环境中,经住了考验,还要求你们将来在和平环境中亦要经受住考验。”

吴宗汉:在重庆这个白色恐怖环境中,领导上很注意组织文化学习,初中班、高中班,到高小都有。很注意组织气节教育、形势学习。

朱友学:抗战八年我们在重庆坚持斗争不简单,当时在特定条件、特定时间下对我们来说是个考验,董老、颖超、孔原给我们讲气节教育。

易树云:……总理从苏联养伤回来,问我从哪里来的。我叫他周副主席,他说叫周恩来同志很好……有一次挑菜回来,特务问我,小孩去办事处做事你们不是平等吗?为什么你挑菜你们周副主席坐汽

车？我答复不上来。周副主席告诉我，我们是政治上平等，工作不同只是分工不同。后特务又问我时我就答复上来了，还说我们可与周副主席握手，你们能见着大官吗？

鲍丁以：我在八路军办事处感到是个大学校，学了不少东西，在办事处有文化学习，梁隆泰是丙班班长，教文化的有金涛等。在办事处一次，我听说×××受了欺负，我帮他打了人，结果关了我禁闭，我在里面唱“囚徒之歌”，被董老听到了，问是谁在唱囚徒歌？董老听说是我被关禁闭在唱后，董老说教育教育把他放了。

黄常：我们的组织纪律性很强，高棠同志一次被扒手偷了，总理狠狠批评说，不是一点钱的问题是政治问题。

邱南章：我们住、衣、食、行都管。我们的伙食标准是多少？工作方法、采购方法，那时买东西不是在一个地方买，是为了注意安全，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我们是副官，工作不是一项，什么都管，伙食、吃穿、洗澡。洗澡在武汉都没有解决，在重庆后来搞了个席棚子。……伙食标准伙食费都是一样的。来客可加个菜，机要科电台的有夜餐费。

牟爱牧：办事处的供应标准开始是每月三块半法币，后来以蔬菜为数量，不以钱为转移，每天每人一斤菜，二两肉，一钱盐，七钱油。我们自己种菜，自己养猪，每月杀一头猪，猪肝分到托儿所；杀的猪给曾家岩、招待所、仓库各分一部分去。猪要够一百五十斤重一头的才杀。我们杀猪开始是请外面的屠夫来杀，他们杀完猪后要拿几斤肉走，后来就自己动手杀猪，一直杀得也很好。

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涨得是很快的，为了保证我们办事处的同志生活水平不因物价飞涨下降，我们的伙食都保证在国民党涨价前三个月的水平，像米、煤等我们一买就买三个月的，涨价了吃完三个月，我们再买三个月的。

李纯泽：皖南事变后我押车去延安，回重庆后，因我会烧菜，同志们就叫我上山管伙食。到厨房还有龚文奎，我们一块搞伙食。龚调走换杨汉章，杨走了就剩我一个人管食堂。每天我们两个人到化龙桥去买菜，每次有三个特务在路口观察，我们就怕特务放毒。厨房的

人都经过审查,固定人去买菜、米、煤、杂货等;在化龙桥有四个点和我们关系很好。后来我们自己养猪,到山上种菜。除了政治斗争外经济斗争也很重要。化龙桥有个老头很好,卖豆腐给我们后被特务弄走了,关了十多天才放出来;经问才知道是审问为什么卖豆腐给共产党?他答是做生意,后来还是供给我们豆腐。

后来特务不叫卖米给我们,后到高店子那里买米给送到小龙坎,再弄上山。后经人从农村买米,从后山弄回来。

陈树云:给毛主席做饭的地方,是办事处原来放工具的地方。清理出来后,在这里起炉灶,叫我端菜,饭从厨房大锅里盛一碗,鸡、鱼都是清蒸,保证卫生和安全。总理亲自过问主席的生活,亲自买毛线叫小李织毛衣。

邱南章:男同志穿的衣服是灰布衣服,女同志穿的旗袍是英丹士林布的。首长穿得也很朴素,……我们买的碗都是土碗,便宜,茶壶茶碗等都是一般的,都拿得出去,也结实。

牟爱牧:1938年下半年彭德怀总司令来重庆住机房街,问他要什么?他指着屋内简单的桌椅说,就这些东西就够了,其他东西不要。

牟爱牧:我们和外面的商人关系搞得很好,买东西去一个口信他们就送来。一说是八路军,知道不吃回扣。

郭正:我们在办事处还买点辣椒面、胡椒面、雪茄、火腿,还买过鱼,想办法给延安政治局的领导改善改善生活。鱼是快上飞机了才买,送到延安还是活的(装在水桶里)。

鲍丁以:1945年5月,钱处长对我说,你不是要回延安吗?你押车到延安去吧。这次去延安的车,车上有林彪的父亲和侄子侄女等,林彪的父亲爱发脾气,爱骂人,一不高兴就爱骂;特务检查他也骂。我对他说你骂敌人就对了。

牟爱牧:还有民主党派一些人,郭沫若、沈钧儒等常来,郭老讲中国作风。有时还有其他一些知名进步人士来。

李纯泽:1940年以后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宋庆龄(孙夫人)到办事处来,还是坐救护车来的,我去接她的。

邱南章:(1940年9月)胡志明在桂林办事处,腿上绑着沙袋,很

注意锻炼。我们的工作互相支持的。

牟爱牧：1946年5月，我们办事处同志租了三艘木船去南京，其中有电台等，蒋介石的参谋长肖毅渊要我去谈问题，听我是四川口音，就和我拉关系叫我老乡，说我们都是四川人，不瞒你说，你们共产党一个人顶十个人，到了三峡，船一靠岸你们上山打游击，又有电台。我们就不得了啦。你们还是坐飞机走吧，我回来把情况汇报了吴老，吴老笑了笑，说他们害怕我们，就坐飞机到南京吧。

黄常：刘医生工作是很负责的，也是大胆的。刘医生给孙光的爱人接生，我不会，他让我做好准备工作，给帮忙，主要由他来接生。他还给一个男同志割包皮，我那时还是个姑娘，没结婚，他只让我把一些用具消好毒，手术由他一人来做。后来还给袁赵俊的爱人阿叶接生，生了一个，刘医生说不对头吧，再等一等，后来又生了一个，一男一女双胞胎。

李超南：那时对有病的，习惯了都要给灌肠。给董老、周副主席做保健，他们那时年纪还不算大，生病少，也没什么保健，一次总理要出去，鼻子流血，我给了药，还是副官在车上给的药。

……

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红岩人，在思想上保持“同流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的精神风貌，在学习上要求工作人员发扬“不懂就学、太忙就钻”的刻苦精神，在生活上坚持“平等相处、毫不特殊”的严格要求，在党性上“坚守革命气节”，在工作中坚持“三勤三化”，即勤学、勤交友、勤工作和职业化、公开化、合法化……红岩这个小小的村庄，记录了共产党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艰难岁月，红岩这个小小的村庄，记录了共产党人追求理想、坚守信念，为实现创建一个新社会而努力奋斗的奉献精神。

驻在重庆红岩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形势的发展和斗争需要，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构，是中共中央建立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前哨阵地，肩负着代表中共中央协调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

责任,是中国共产党对外的主要窗口;同时也是领导南方各省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争取中国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战斗堡垒”。(《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红岩的一项重要任务,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打击顽固势力,红岩记载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辉煌篇章。

抗战时期处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党派和人士始终是主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但在抗战初期,他们企图依赖国民党政府抗战,热衷于议会政治。他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成立表示了无保留的热烈拥护和欢迎。尽管他们并不认为参政会已经是真正的民意机关,但他们普遍认为,参政会是“民主的曙光”,是“民主的发端”,他们希望国共两党的争端“与其决于枪杆,不如决于票数;与其决于疆场,不如决于议场”;他们要求国民党政府尽量采纳、切实执行参政会的决议,“打破过去决而不行,行而不彻的积弊”。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法宝。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需要,中共再次调整自己的策略,提出“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合作,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口号,并将过去提出的“建立民主共和国”、召开“国防会议”、组织“国防政府”的政策,改为“充实和加强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中共对时局宣言》),也就是在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基础上吸收抗日的各党派参加政府工作,使之“充实和加强”。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分别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并不是当时中国的全部社会政治力量,国共两党从数量上不占优势,而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还有很大一片被称为“中间势力”,他们大多数为各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是在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独裁,形成了独裁绝对排斥民主,民主力量绝对要冲击独裁的政治现象,中间力量从对国民党的期望到失望、再到绝望。“中间势力”的广泛性、复杂性是共产党活动的客观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他们的态度、立场往往可以影响和左右方向性的问题。因此,谁能够争取到中间势力谁就能够赢得天下,这是国共两党斗争中一直贯穿的政治内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把中间势力争取了过来,从推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是贯穿于南方局历史的一条主线。与国民党打交道,进行合作的谈判,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民主进步力量,组成人民民主革命力量,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一直是南方局的主要任务。南方局领导党的工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不同的是,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需要靠一种信仰的力量来支撑共产党人。他们面对的国民党是与共产党完全不同性质的利益集团,只是在解决民族矛盾下的求同存异,这种局面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中间政治力量的特点是:以爱国为核心、以民主为目标、以团结为基础、以和平为导向,为救国救民而打破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以不左、不右的政治立场,参与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并以此强调自己的生存空间和价值。南方局抓住这个特点,从团结抗战出发积极地推动中间力量的发展壮大,以期与其建立坚实的统战联盟。

南方局与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和社会中间力量密切团结合作,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政治进步发展。1939年,南方局在国民参政会推动“统一同志建国会”的成立,1941年春,在周恩来、董必武的帮助推动和直接领导下,经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屈武等筹划酝酿,于当年5月间,在重庆领事巷10号康心之的公馆(即屈武的住所)秘密成立了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习惯简称“小民革”,以便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简称民革相区别)。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公然取消章伯钧、张申府和共产党员参政员资格,查封桂林、昆明、成都、贵阳等地生活书店、读书生活社、新知书店。中坚力量感觉到生存的危机!在南方局的推动下,1941年3月“统一同志建国会”改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秘密建立,由此第三力量核心形成。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同年,九三学社也宣告建立。重庆红岩,见证了中国民主党派的建立和发展历程。南方局的红岩人,在这一过程中为中国民主政治文明发展表现出了巨大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建立,梁漱溟去香港秘密办报,行前他专

门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得到支持。周恩来要求在香港的廖承志同志给予有力的支持。梁漱溟与当时在香港负责《华商报》的中共党员范长江商议,决定取名为《光明报》。开始时,梁漱溟想靠自己的力量办报。但港英当局规定办报要先立案,交付押金,还要有保人;要请律师,也要先交一笔钱,以后每月还要交钱;印刷厂也需先付钱。正当梁漱溟一筹莫展之时,廖承志嘱咐范长江,要他以一位南洋侨商的名义,资助 4000 港元给梁漱溟,解决了他办报的燃眉之急。在廖承志的大力支持和救国会海外组织的具体帮助下,1941 年 9 月 18 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创刊,与广大读者见面。除在香港公开发行外,同时由陈友仁、阳翰笙将文件译成英文,向英、美各国驻港通讯社介绍。民主政团同盟宣布的宣言和政纲,明确提出坚持抗日、加强国内团结、结束党治、实践民主精神、厉行法治、保护合法自由等政治主张,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罗隆基回忆:民盟中央同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合作,在其成立后就开始了。民盟的某些中央领导人,如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和我自己,早已同共产党在重庆的领导人,就关于抗日反蒋运动的问题,经常秘密协商,并共同进行工作。举几件很小的例子来说:早在民主政团同盟的时代,民盟四川、云南两省的实力派军人领袖刘文辉、龙云已有了秘密的关系。他们两个都是民盟的秘密盟员。他们是当时西南实力派主张抗日反蒋的人,都向往共产党在抗日反蒋中的领导,都愿以自己的实力,对这个共同的目的有所贡献。由于刘、龙两人都是民盟的盟员,四川方面通过张澜同刘文辉的联系,云南方面通过我同龙云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四川、云南两省实力派同共产党的密切合作。刘文辉有时到重庆来。当他在重庆的时候,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民盟方面的章伯钧和我,同刘文辉四人就进行过秘密会商。在云南方面,经过我同龙云的联系,共产党方面亦派有秘密代表驻在昆明。后来昆明同延安又有了秘密电台的联系。龙云还指定缪云台,民盟方面由我代表,加上共产党在昆明的负责人,亦成立了一个 3 人的秘密委员会,经常讨论怎样团结西南几省的实力,准备支持和策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力,以贯彻抗日到底的目的,同时亦准备防止蒋介石发动

内战的阴谋。这些以往的具体事例，不仅说明当年民盟秘密盟员刘文辉、龙云两个人同共产党早年的联系，实际说明了早在旧政协以前，民盟在抗日反蒋这个共同的目标上已同共产党进行了真正的合作。（《民盟在重庆活动》）

罗隆基的这个回忆，我们可以从国民党的史料中得到印证：徐远举对重庆民主党派的记录：“民主党派在西南活动最显著的为民主同盟，其次为民主建国会，农工民主党系在民盟掩护之下活动，是时民革尚未成立，三民主义同志会、九三学社在四川均无组织，仅有杨杰、许德衍个人的活动……”

侯外庐在回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活动时写道：“小民革来自各党派的成员，大都是有成就的政治活动家，他们有阅历，有经验，在各自党内颇具影响力。这样一类人，个个都善于独立思考，很难有力量让他们盲从某一个人，某一个党。这些同志中，在国民党内有立法委员以上地位的，不乏其人，拿着国民党政府高薪厚禄的更是比比皆是。但是，因为国民党腐败，国民党笼不住他们的心。他们都是真诚的爱国者，经历了多则几十年，少则日寇入侵以来十余年的政治斗争的实践，通过自己头脑的比较、分析、判断，认识到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最有水平，最有抗御外敌的实力和争取民主的诚意，最能代表民族的希望。因此，他们走到一起来，支持共产党为抗日和民主所作的斗争，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中，走到最前面，心悦诚服地愿意听取共产党的意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些来自各民主党派的同志，所以有这样的决心和行动，相当程度上，直接取决于我党政策和领导的英明。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执行党中央统战政策的水平和艺术，我个人认为是卓绝的。他身体力行，证明了共产党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襟怀和至诚。”（《民盟在重庆活动》）

刘仲容晚年谈起周恩来人格与形象对他所产生的影响说：“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周恩来的形象。”这句话我认为很反映周恩来对于统一战线所起的非凡作用。（《民盟在重庆活动》）